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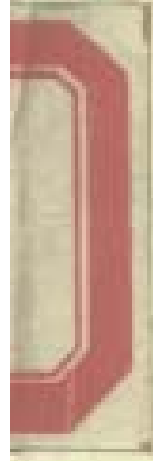
MAN

人文类型

[英] 雷蒙德·弗思 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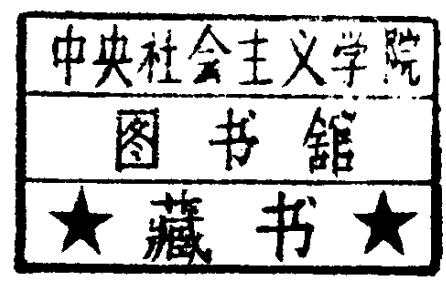
912.4.49
DI14/B

77983



人 文 类 型

[英] 雷蒙德·弗思 著
费孝通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1年·北京

Raymond Firth

HUMAN TYPES

ABACUS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in 1975 by Sphere Books Ltd

根据英国斯菲尔图书公司 1975 年修订版译出

RÉN WÉN LÈI XÍNG

人 文 类 型

〔英〕雷蒙德·弗思 著

费孝通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84-4/D·57

1944 年重庆初版

1991 年北京修订第 1 版

199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3800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30 千

印张 5 5/8 插页 8

定价：3.1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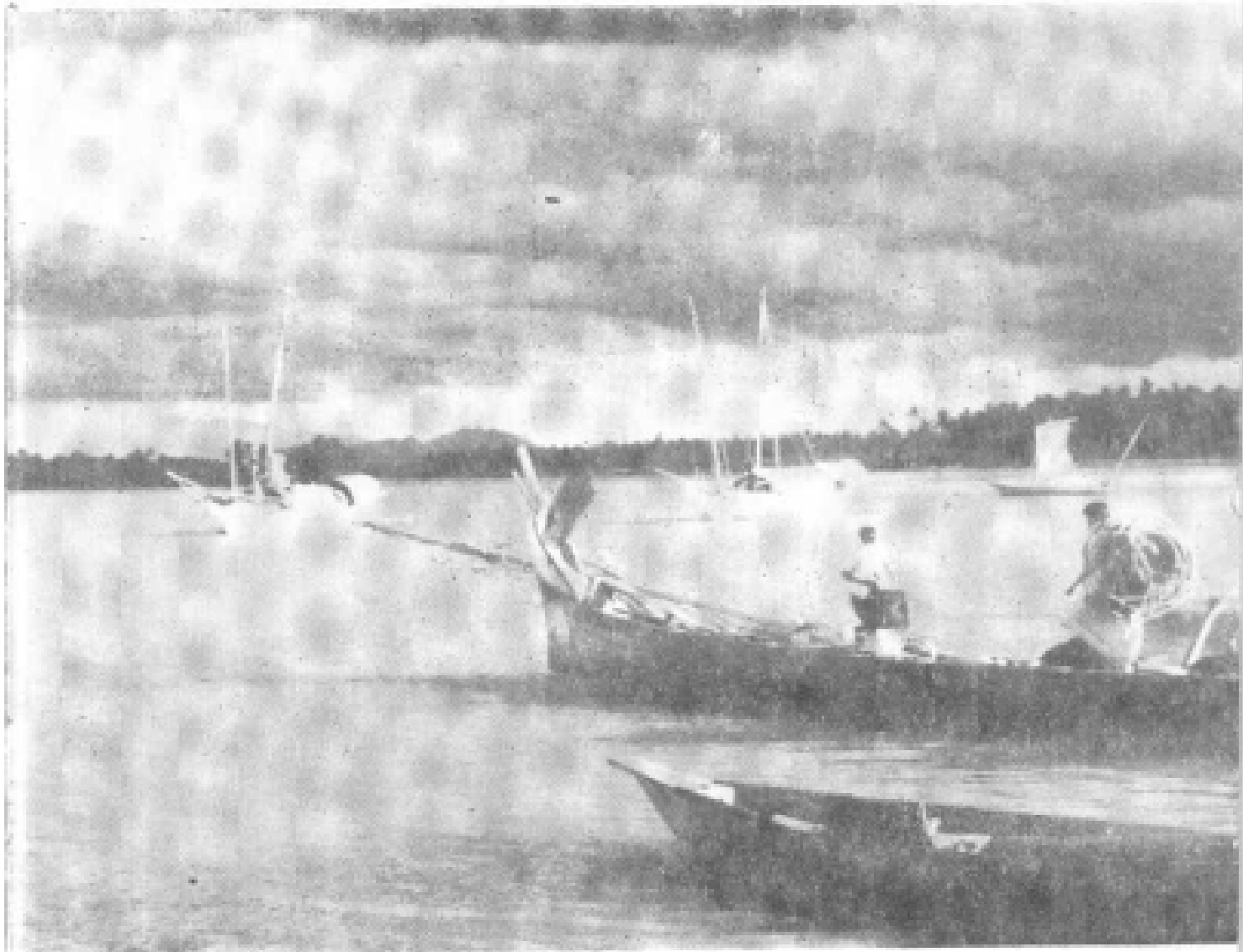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右)和译者在伦敦的合影(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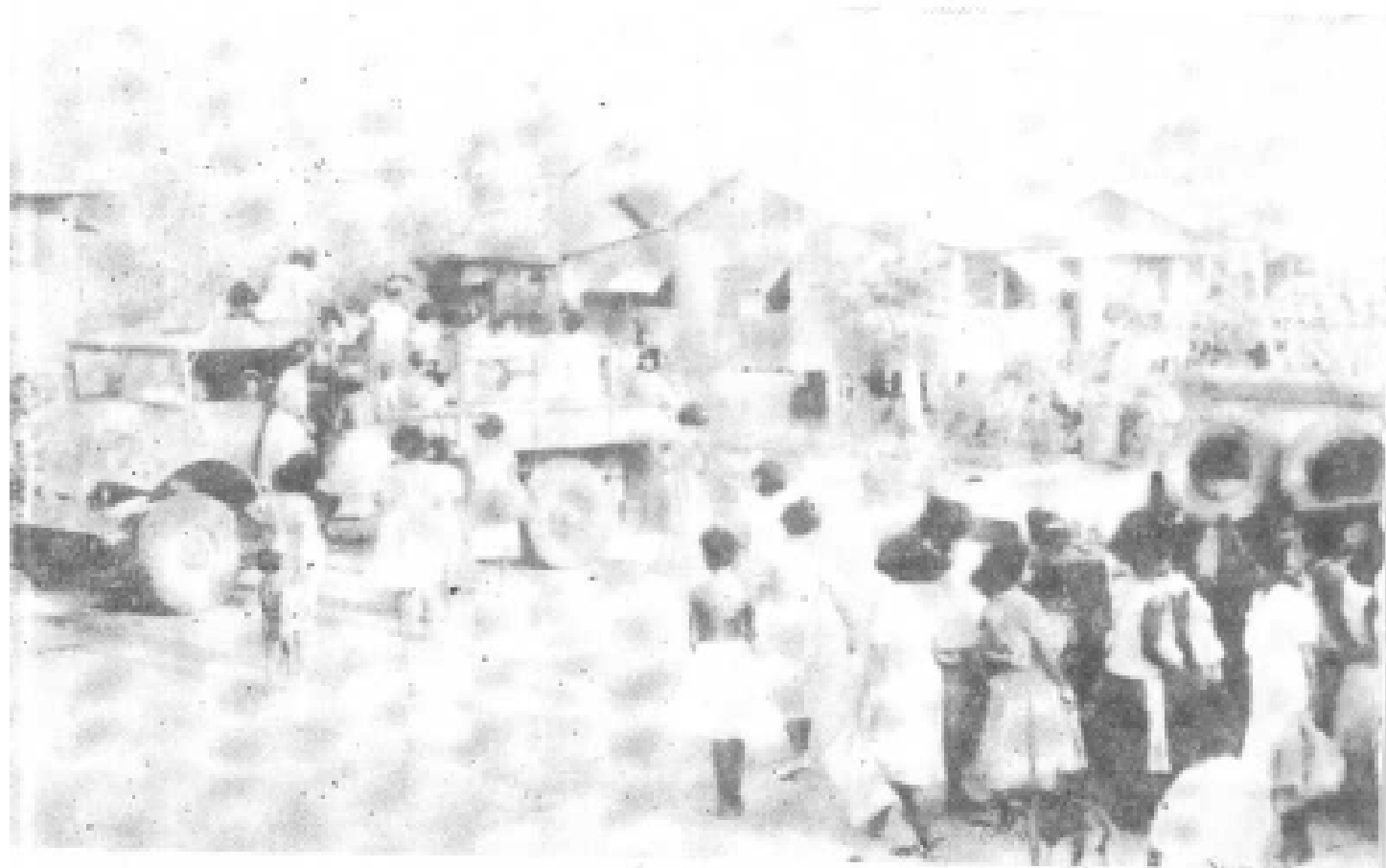
1. 用竹烟斗吸烟(新几内亚塔皮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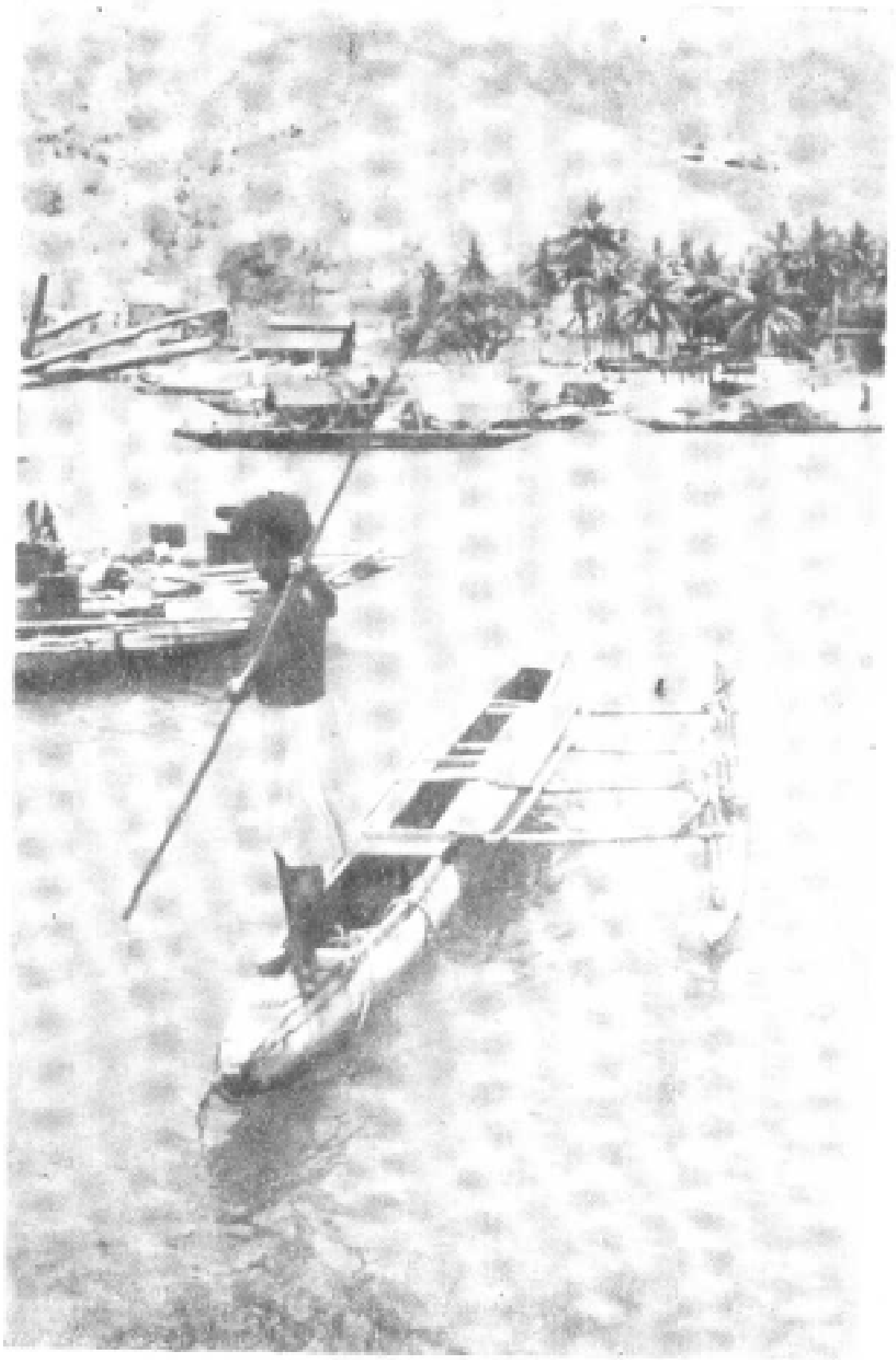
2. 港湾中马来人的小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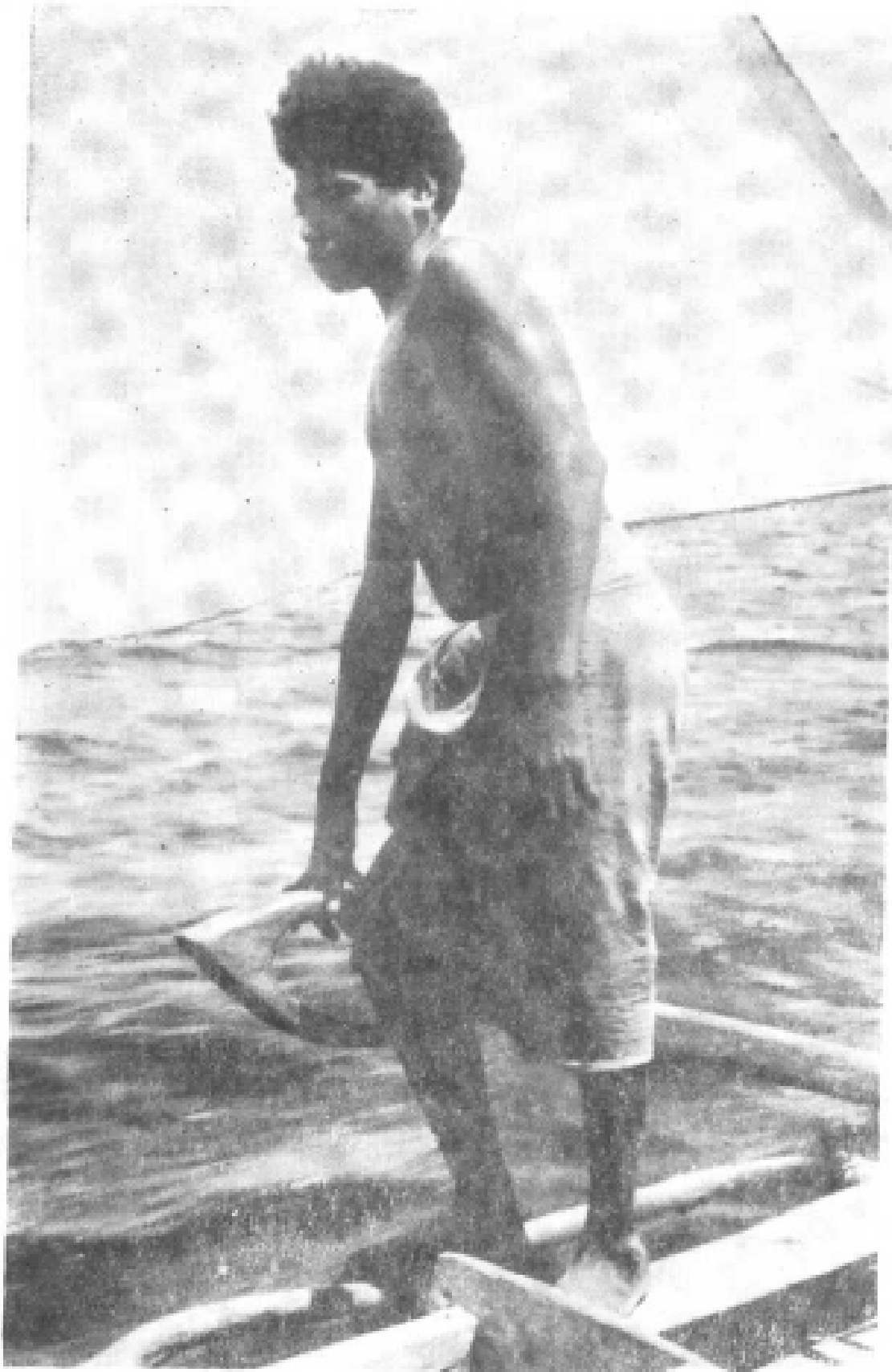
3. 身着传统服饰的米尼族年轻妇女
(新几内亚高地)



4. 送别出访的妇女板球队(巴布亚基拉基拉)



5. 用篙撑装有舷外浮木的独木船(莫尔斯比港)



6. 在独木船上掌舵(巴布亚南海岸, 迈卢)



7. 用桐皮布偿付造船者(蒂科皮亚)



8. 为合资购买贸易用的帆船捐款
(巴布亚莫尔斯比港托亚里皮人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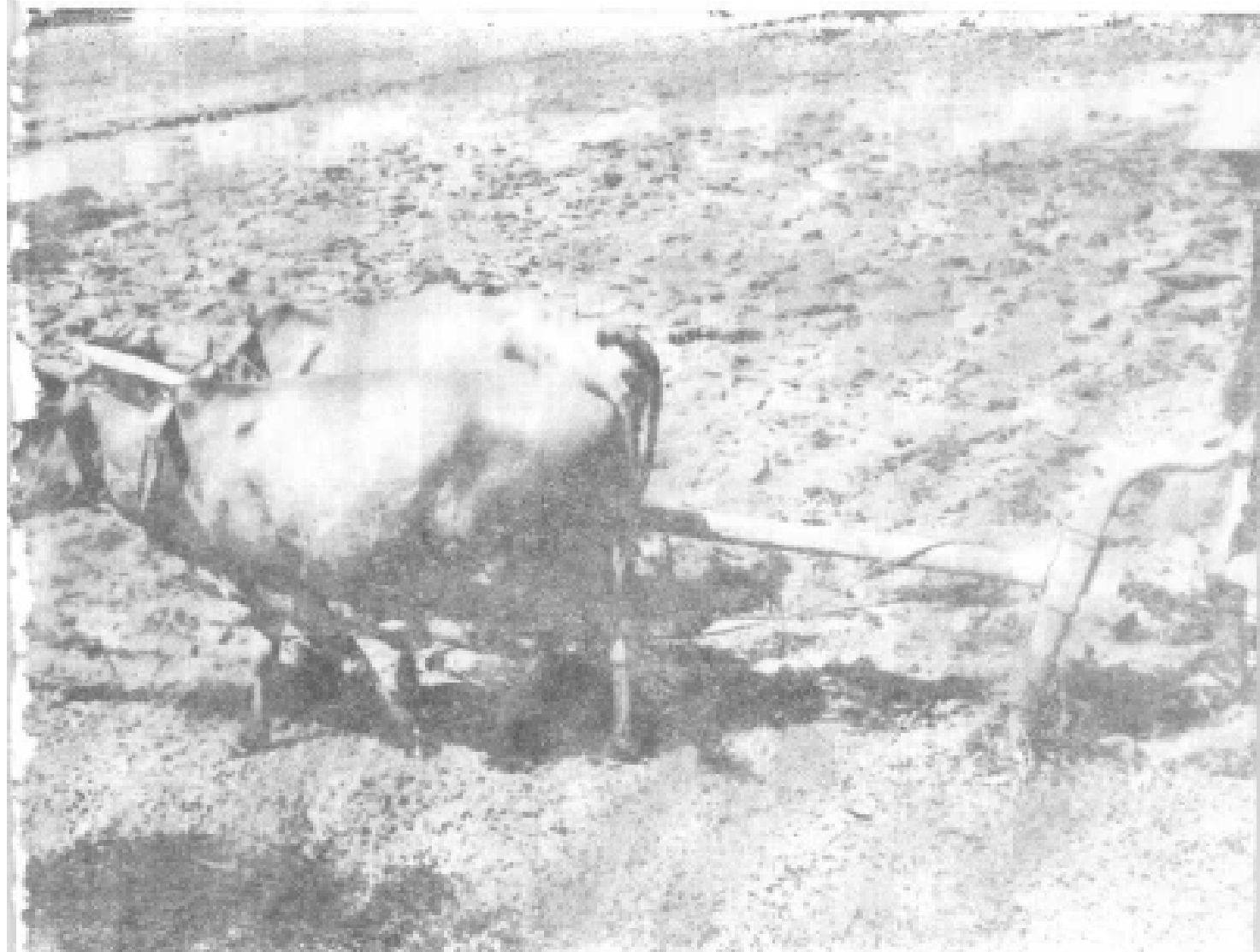


9. 在海滩上赶鱼(蒂科皮亚)



上拉渔网

10. 在马来西亚吉兰丹海滩



11. 用牛耕稻田(马来西亚吉兰丹)



12. 起秧苗(马来西亚彭亨)



13. 在集市上卖水果和蔬菜(新儿内亚拉包尔)



14. 卖筐筐和水果(马来西亚丁加奴)



15. 向扎里亚的首长表示效忠的仪式(尼日利亚北部,1945年)



16. 用地灶烹调准备晚宴(蒂科皮亚)



17. 用酒祭奠神和祖先(蒂科皮亚, 1952年)



18. 带面具的跳舞者扮演女精灵以及陆上和水中的巨大的动物精灵(尼日利亚东部, 奥尼沙, 1945年)

译者的话

我翻译的《人文类型》一书，作为《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三种1944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原著的作者是雷蒙德·弗思。该书最初是由英国托马斯·纳尔逊父子公司于1938年出版的。四十多年之后，我的译本经陈观胜和李培荣两位同志根据原著1975年的修订本补译后，得到了再版的机会。付印前编辑同志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讲一讲该书翻译的经过。

原书作者是我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以下简称伦院)留学时的老师。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36年秋季。他当时还年轻，只有三十六岁，长我十年，是伦院人类学系的高级讲师。弗思出生于新西兰的奥克兰市。在该市的大学毕业后，到伦院师从B.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攻读社会人类学，是这位教授手上第一个得博士学位的门生。后来继承了这位老师的讲座，为伦院的教授。他们师生两代使伦院在社会人类学园地上，以功能学派的旗子，独占鳌头达二十多年之久。我是1938年在伦院毕业的，当时欧战已迫在眉睫。我返国不久，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即离英去美，不久逝世，所以我是在他手上得博士学位的最后一人。一门弟子，本书作者和本书译者适占首尾。当我写此前言时，首尾之间的十余位同门弟子均已谢世，惟独我们两人尚在人间。

我从伦敦回到昆明，正值抗战初期，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开始几年集中力量开拓内地农村调查。四十年代初，创办云大社会学系的吴文藻先生离开昆明去重庆，我不得不兼顾系务和开课讲学。这时我深感教材缺乏，所以赶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

和这本《人文类型》作教学参考书。前一本书提供了解剖文化结构的框架和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后一本书为比较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范本。两本书加在一起正可以作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入门的引导。译成后即编入吴文藻先生编的《社会学丛刊》出版。

《社会学丛刊》的编辑宗旨，在丛刊的总序里有所说明，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中国社会学者的“信念及要求”。总括起来有两条：一是“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一是“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社会学的基础”。对社会学的方法在总序里也有一段阐述，编者认为科学工作必须“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当时的行文，现在读来不太利落。意思与现在人们熟悉的“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是一致的。当时之所以有这种要求，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现在的年轻读者可能已不甚了解，所以得申说几句。

当我在1930年到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时，系里用英文讲课的外籍教师已经不多，大部已由留学回来的本国教师所代替，但不少人在讲课时还是用英语，即便使用本国语言，也还得夹入大量外语词汇，因为许多外来的社会学概念尚未有适当的译法。班上所用的教材和指定的参考书几乎全是外文的。这很能说明，这门学科还没有在中国生根。这种情形使得一些想借助社会学去了解中国社会的学生感到不满。于是有一部分社会学者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

怎样把社会学和中国社会联系起来呢？当时的答复是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所谓人类学的方法是指当时西方人类学者所采取的实地调查的方法，就是以观察、分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起点，把观察结果提高到理性认识，通过反复比较求证，获得对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实质上，这种方法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这个学术

方针不仅当时在这门学科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认为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再说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最早是由抗战前(1937年)曾在燕京大学讲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提出的。他是和马林诺夫斯基同时又齐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当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时，就用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开课讲社会人类学。几乎是同时，弗思在大西洋对岸出版了这本《人文类型》——一本比较社会学的教材。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三十年代，随着科技的发达而来的交通、信息、运输和经济的发展已把这世界上原来分片分块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区联成了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被联系在一块的各地居民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却是在长期各自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下养成的，富于各美其美的排他性。现在突然把许许多多生活方式不同、思想意识殊异的各地居民投入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体系之中，人类世界出现了一个世无前例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人类怎样在这个格局中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严重问题。社会人类学中出现比较社会学这个苗头与人类世界的这个大变化是分不开的。

回想一下人类学的这段历史是富有意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家，开始深入到海洋里的孤岛上直接观察生活方式上富于地方特点的居民，创立了社会人类学里的功能学派。他们从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岛民生活中具体分析其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的系统性，使这门学科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回头去看，他们的研究反映了当时尚存在着“文化孤岛”，就是说世界居民中还保留着的门户深锁的深院小庭，这些实际上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多元一体格局的小社区。从这个起点出发迎接多元一体格局所带来的对人

类发展前途的挑战，社会人类学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现了比较社会学的尝试。

比较社会学实际上是想引导在封闭式小庭院里培养出来的各美其美的文化观逐步开放，进入美人之美的相互容忍的文化观，来削弱以至消灭原有的文化排他性，为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和平共处的意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去看《人文类型》这本书，它在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中的地位就容易明白了。

当前的世界，多元一体的格局日益深化。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上还没有走出各美其美的境界。为了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在培养美人之美的容忍和观摩精神上还需要作进一步努力。至于怎样稳定多元一体的格局并预见它发展的前景，已是应当及早提到日程上的课题了。今天的人类学似乎还没有赶上这历史的要求。这是后话，在此不多说了。

关于这本书的修订和再版，还应当说几句话。我的译本出版后，曾经设法寄给弗思老师，但其后由于国内局势的变化，我们之间的信息来往中断了。后来，社会学受到批判，各校社会学系全被撤消，《社会学丛刊》更谈不上继续出下去了。已经发行的各书埋在尘堆里有三十多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恢复了国际文化学术交流。八十年代初弗思参加英国文化学术访华团来到北京，我们才得重晤。相见之下，恍如隔世。他已年逾八十，早已退休，并因其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受封爵士爵位。

1983年我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通知，该会决定授我赫胥黎奖章并邀我去伦敦受奖，我才有再次访英的机会。我一到伦敦就去拜望这位老师。叙谈中提到一桩桩往事。他兴冲冲地从书架上找出我当年寄给他的那本用战时后方粗糙土纸印成的《人文类型》，他多年来一直珍惜地保存着。同时他又送了我一本1975年由斯菲尔图书公司出版的《人文类型》的英文修订本。我当时就说，

我返国后一定要根据这修订本修订我的译本，重新出版。这个诺言却一直成了我心头的一笔债务，而且估计自己能支配的时间这样少，要偿还这笔文债，一时无望。有一天陈观胜和李培荣两同志来看我，我诉说了这桩心事。他们同意帮我一把，承担修订译稿的事。稿成，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要我阅校一遍，因此又耽搁了一年。现在付印有期，写此前言，作此交代。拖延之责，我当自负，并此告罪。

费 孝 通

1988年1月15日于香山饭店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种族特征和心理差别	11
第二章 人和自然	38
第三章 原始社会的劳动和财富	59
第四章 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	77
第五章 行为的规则	100
第六章 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信仰	117
第七章 人类学在现代生活中	142
文献目录	161

导 言

这本书是很久以前写成的，现在出版社要将它重新出版，我对此很感欣慰。此书不仅在英国日益为人们所需要，而且还译成九种东西方文字。这表明它满足了人们的一种需要，即人们需要有一本书能简洁明了地说明社会人类学是研究什么的，它在现代世界中有什么意义。

我首先谈谈此书不论述的内容。自从它初版以来近四十年里，社会人类学的内容已更加精细复杂。而且经济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日益发展。它们对决策、交易和交换的理论，对获得、保持及行使权力的过程和结构的理论，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它们还对宗教和巫术之类的特殊现象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研究。但是它们越来越迫切要求有更精确的分析方法，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分析。尤其是它们不但对人们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方式非常注意，而且对他们想干什么和信仰什么也都更加注意。所以社会人类学必须考虑民族学、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和形式人种志。结构主义观点作为一种辩证对立的研究方法和一种有关人类思维活动的理论，比上述所有学科都更加引人注目。而且，作为一种理智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坚决要求彻底修正我们研究人类学资料的思想方法。

此书不是论述这些理论和方法，而主要是在广泛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论述社会中的人——他们的各种制度、思想和行为模式。我在写这本书时，心里当然有一个理论框架，其中一些理论贯穿在我对论题的安排上、例子的选择上和对数据的解释上。随着时间

的流逝，我的思想起了某些变化，这也反映在我对初版的修改上。但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没有变，因为人类社会有各种类型，作判断时需要特别注意下功夫去进行了解。为此需要一套研究方法，社会人类学提供了这样一套方法，即对风俗习惯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这本书主要是说明，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异族人民。它研究一切人类社会——尽管西方和东方社会极为不同，研究起来可能特别困难。社会人类学不仅研究“他们”，也研究“我们”。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西方社会的行为方式也是希奇古怪、不合道理的，正如我们看非洲或南海富于异国情调的社会的行为方式一样。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过去的结论的依据至今仍是正确的。

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记述和阐明人类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就好象是排列在一张时间表上似的。我在最后一章特别指出，社会人类学很注重研究不同时期社会制度的变化。

第一章头两页列举的关于行为和信仰的变化的几个例子，就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在欧洲和北美，人们已不再认为女人穿长裤是希奇古怪的事了；年轻人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如果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至少也是容许的事，甚至该青年男女的父母也是这样认为的；严格执行教规的罗马天主教会已不再禁止教徒在星期五吃肉。有趣的是，引起变化的直接原因却各不相同。在英国，当然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妇女们才认识到穿长裤有许多的实际优点。由于大批妇女不断参加工业及其有关行业，认为妇女穿长裤有“男子气概”的看法渐渐消失了，把处于支配地位的妻子说成是在家中“穿长裤的人”这句话也不再有什么意义了。随着男女青年都以“牛仔裤”作为下装（这是个旧词），以裙子和长裤作为区分两性的重要标志已基本上失去意义。由此可见，一件服装外表的改变与公认的两性区别的标准较深刻的改变是有联系的。

越来越多的人对婚前性自由采取容忍态度，是与物质生活的变化有间接联系的。汽车特别是摩托车的便利，使青年人较易躲避家长的注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已能以很低价钱购得相当可靠的避孕工具。同样重要的是：家庭中权威角色和权威观念的改变，青年人有更多的自由支配他自己挣得的工资，对包括性行为在内的各种行为的道德和宗教约束力的削弱，以及从根本上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弗洛伊德观点的影响，而普遍地愿意以较理智的，不那么动感情的语言讨论性关系的问题。

天主教徒在星期五从不可以吃肉改变到可以吃肉，是由于废除了教廷的一项宗教敕令而最终实现的。然而这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图使教会现代化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和下列一些现象多少有直接的联系，如做弥撒使用本地话，某些教士要求结婚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把基督教有关社会正义的教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

对待种族关系问题的态度的改变，尽管很不彻底，却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特别是美国南部，那里以前为了阻碍美国黑人的发展与合作而正式实施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限制，现在已经不再实行，近十年来人权运动已成功地废除了大部分种族隔离界线。在英国，这种改变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由于战后有大批西印度群岛移民，后来又有大批亚洲移民，而且在本地出生的“有色”人也不断增多，种族意识和种族摩擦的问题日趋表面化，引起了官方的注意，社会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国家设立了种族关系委员会，实施了一些措施，虽然效果有限并受到很多批评，却显然是力图使种族平等的观念成为人民公认的、法律上有效的官方政策和社会义务。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最明显的制度改变，就是放弃殖民主义这一曾经公然得到认可的、对他国人民的发展进行政治统治的

制度。过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亚洲和非洲各民族，差不多全都取得政治独立，大洋洲诸地方也已大都得到自治。有些“自治共和国”还在政治上受宗主国的控制，它们成了卫星国，或是某一强国领导的联邦中的成员国。对某些地区的“托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统治的延续。现在时兴地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然而早就以其它形式存在的经济上的统治，至今仍在许多领域内存在。尽管大多数新兴国家的自由受到这些限制，它们的社会结构却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了现代的政党，本地官员接管了行政机关，本地的社会知名人士和中产阶级的团体增多，技术和经济发展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化等问题都具有更多的地方色彩。

然而在所有这些变化的下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持续性。再看看我刚才列举的关于变化的例子。

西方妇女虽然在许多场合中穿上长裤，但她们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失去其妇女的气质。西方妇女尽管有时穿“无领无肩的”衣服，但在海滨穿的游泳衣一般仍是将乳房遮盖起来的，而男子则裸露到腰部。妇女只在个别的场合才象男子那样打扮。她们那样打扮，并没有放弃女性角色，而是强调女性角色，表示她们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还要注意到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例如苏格兰人、希腊精锐步兵队士兵、僧侣和修道士、某些舞台角色（主要是喜剧），以及某些同性恋者“男扮女装”的暧昧行为以外，男人穿裙子，肯定是不合适的，人们认为裙子仍是妇女最好的服装。在关于两性关系的行为和道德观念上，也有很大的持续性。西方社会对男女青年婚前同居的现象固然非常容忍，却仍然坚信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即使不是神圣的，也是正当的。无论在西方世界的什么地方，都不容许一个男子有一个以上的妻子，也不容许一个女子有一个以上的丈夫。婚外性关系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准则，从法律的观点看来就既是道德上的错误，又是违法的行为。社

会对离婚所持的否定态度，也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法律上的阻碍已大为减少。向现在的配偶提及他（或她）已离婚的配偶，往往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在同一社会环境中让两个活着的人与同一个人结为夫妻的想法，对许多人来说是令人难堪的。可见过分夸张的两性关系习俗的变化，一直围绕着婚姻观念在旋转，但却没有动摇牢固的一夫一妻制。

天主教有关吃肉的信仰，也有一个基本的持续性。尽管已有了准许在星期五吃肉这一重要变化，也就是说，已不把真正的肉作为赦罪仪式象征物了，但在领圣餐时吃象征性的肉的基本意义仍保持不变。领圣餐的人仍相信他们吃了圣饼，就等于吃了救世主基督的身体，但他们的眼睛看见的却不是肉，而是作为他们所吞咽的神圣物质的象征的面包。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其中的关于转变的观念与一般自然法则不符——这种信仰已持续了许多世纪，它与其他社会的信仰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种族关系方面，虽然在公开的、正式的场所，在法律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偏见和歧视仍广泛存在，社会上对人的态度仍是以肤色和体格特征来决定。在美国，虽然许多道义感强的黑人 and 白人曾为促进种族平等尽了很大努力，但根深蒂固的怀疑心依然存在。为入学和求职而发生的冲突、大学中的“黑人研究会”、黑人穆斯林和“黑人权力”团体的活动都证明这一点。问题还不止这些。波多黎各人、“奇卡诺人”、其他具有西属美洲血统的人以及在美国的各种东方人为获得他们心目中的正当待遇而进行的斗争，都具有种族对抗的成分。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问题，例如新西兰的毛利人、加拿大和美国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土著居民、阿萨姆的那加人、中国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包含了可称之为种族关系的因素。我们都很清楚，在英国，几乎被人称为“种族关系行业”的大

量书籍和文章，指出了这种形势的敏感性以及公开的和隐晦的偏见的持久性。

战后，一些在政治上获得自治的新兴国家发展迅速，引人注目。然而，即使在这里，以前的社会结构的一些因素还往往继续存在。为了努力塑造一个与前政权下形成的社会特性有区别的新的社会特性，传统的制度往往受到重视和利用，有时还会重新流行起来。随着传统的部落、氏族和地方力量的集聚，往往出现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在处理公共事务或个人私事时，人们仍然愿意遵循社会礼仪的传统模式办事。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因此对它很重视。

最近有些批评家说，社会人类学者是在殖民主义的框架中从事研究工作的。还说这些人类学者即使没有积极支持过殖民政权，至少也是采取容忍的态度，没有对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剥削提出抗议。我和其他许多社会人类学者一样，曾在殖民地工作过，因此也不得不遵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所作的重要安排。但是尽管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作宣传或向社会提出抗议，我却没有隐瞒我对这类问题所持的人道主义观点。任何一位了解我的观点的读者都能清楚地看到，我从本书一开始就力图揭露殖民主义和类似的各种剥削的劣迹，批评种族主义思想，阐明异族社会的人民的制度，指出不论一个民族有多么小也应当受到尊重。我还指出我们认为极其自然和正确的西方行为方式，不过是建立在利己的或多少有些不合理的设想之上的。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几乎每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表面上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以致任何民族志的记述几年后就陈旧过时了。我在前文已指出，我在本书中列举的许多材料阐释了社会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原则。因此我虽然在这本书的某些部分增添了若干小节来补充这篇导言，并在另几部分对文字作了些修改，但

仍将正文保持原来的样子，因为那是人们基本态度的变化和制度的变化的历史例证，是“人文类型”恰当の説明。

我在文字上所作的一个重大修改，反映了我们在描述基本研究资料时通用的名称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我们对异族社会和文化进行大致分类时用的词汇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对异族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在人类学者的研究领域中占相当大的比重。

“原始的”、“野蛮的”、“土著的”这几个词，是与主要指西方及亚洲发达文化的“文明的”一词相对比而言的，在三十多年前还广泛流行，现在已不再适用了。这几个词不但已陈旧而且还令人感到屈辱。人类学者往往解释说，他们使用“原始的”一词，仅仅是指技术不发达，并不含社会、道德和宗教的不发达的意思。譬如说，“原始的”亲属制度往往非常复杂，比西方的要复杂得多；“原始的”宗教思想也往往相当复杂并有深刻的含义。然而这个词对不是人类学者的人来说，其含义往往是含混不清的。不论是在遥远的太平洋岛屿还是在非洲腹地，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范围也很广，即使按人类学者的解释，用“原始的”一词也是不正确的。因此现在最好不用这个词。比“原始的”一词流行得更早的是“野蛮的”一词，其情况也相类似。以前，“野蛮”是与热带地区的裸体和草裙，以及以棍棒或长矛作武器相提并论的，野蛮行为的标志是暴力。暴力是受到外来威胁时作出的社会的抵抗或反应，是社会公认的形式。但是即使不提上次世界大战创巨痛深的经验，人们也能在西方国家见到许许多多恐怖行为、刑讯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因此把相对来说是爱好和平的非洲人或南海岛民的偶然行为称为“野蛮的”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虚伪的。所以人类学者一般已不再用“野蛮的”一词说明社会类型或文化类型。〔著名的法国人类学者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使用这个词是个例外。他的书原名是 *La*